“古道千盘草木荒，戍旗一片黯春阳。

谁知石烂山枯后，犹有残碑纪汉唐。”①

这是清代诗人李銮宣在新疆看到汉、唐古碑所赋的诗句。这些古碑历经千余年来的风风雨雨，屹立至今，说明汉人在新疆并非外来户，而是早在两千余年以前就已加入了新疆多民族大家庭的行列，吐鲁番及其它地区发现的大量汉文文书及其它汉人生活物品都足以证实新疆汉人的存在与汉人聚居区的繁荣，这是由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经济纽带所联系，并自西汉时期纳入祖国版图以来的政治现实所确定的。而汉人定居新疆是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的，具体而言，乃始于汉，盛于唐，其后历经几度升、沉，至清又恢复了在祖国边疆中的重要地位。两千余年来，汉人不仅为新疆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而且在融合西部边疆多元文化进入祖国统一文化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时至今日，汉人在开发和建设新疆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无庸赘述。

但是历史是变化不居的，汉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价值取向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本书立旨重在一个“变”字，力求作到立体的动态研究，摆脱但作平面静态考察的传统套路。这一变化

①《塞上四首》，《历代西域诗选注》，新疆人民出版社，页 13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仅决定于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及其影响，而且也同周邻的边疆诸族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新疆汉人固然显现了全国汉人的共性，同时又显现了边疆汉人自身的特异性。

汉人落户西域及其古俗

汉人虽非新疆的土著民族，但却是最早了解这一地区和最早定居这一地区的民族之一。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是玉石之乡，其中位于昆仑北麓的于阗尤以产美玉闻名，而远在中原的古华夏人却特重玉饰，在汉字中凡表示珍宝的词汇几乎都加以玉或贝的表意偏旁，贝产于东海，尚属易得，美玉则来自何方？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学术之谜。对此，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殷墟妇好墓中发现的玉经科学鉴定原产地来自今和阗，而巴里坤则出土了产地远在东海的环形贝，这说明早在远古或上古时期，内地的华夏人就同古新疆的土著居民存在着密切的玉、贝交换关系，由之证明了后日

所称的丝绸之路在更为遥远的古代本来是一条玉、贝交换之路。因此，当西方尚以迷茫的目光注视着这一陌生的地域时，我国先秦古籍《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中都已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关于昆仑、坳泽、流沙、瑶池、春山、赤水等只有新疆才有此地貌特征的记载，其中《穆天子传》出土于晋之汲郡魏襄王墓（一说是魏安釐王墓），文字古奥，确为先秦古籍无疑，内记公元前一千年周穆王的一次西行壮游，历经赤乌、曹奴、容成、西王母、韩、西王母、寿余、诸干、西膜等‘国’（其实无非是部落），这些古“国”似乎大部分都在今新疆境内。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丝绸贸易代之而兴，丝绸是古华人的伟大发明，它是由蚕所吐丝织成，光艳轻薄，是古代世界最精美的织品，售至古罗马乃至寸帛价胜寸金。古华夏人也以此自豪。华夏人崇龙，至今汉人仍以龙的子孙自诩，而‘龙’究为何种动物，迄今莫解。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或多种图腾复合物，似皆未得正鹄。按龙之形固如蛇或节肢动物之状，但可大可小，可入水，可升天，变幻莫测，而蚕之为形恰如蛇状，却一生数变其生存形态，更合龙之特性，当然，龙是蚕至今还只能算是一种假说，但我认为，这一假说如能成立，则更足证实了蚕丝的高贵价值已赋予了蚕的某种神性。历史的演变也充分证明了丝绸贸易加速了流沙东西的进一步联系，至迟至秦朝，华夏人

必已涉足西域了。这些人或是商人，或是使者，虽然正史并未留下什么明确的记载，但直到汉兴，乃至张骞“凿空”之后，西域人仍称华夏人为“秦人”，并留下秦人善凿井的口碑，则更足说明，至公元前三世纪之世，中原的华夏人和西域土著相互之间已更加了解和熟稔了。

但是，汉人大批进入和定居今新疆地区毕竟是汉开西域以后的事，换句话说，汉人涉足天山南北是与新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相同步的。这一盛事发端于张骞西使，肇始于李广利伐大宛，而完成于郑吉出任首任西域都护。西汉武帝之世，汉与匈奴的战争全面爆发，张骞肩负“断匈奴右臂”的政治使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欲结月氏共反匈奴，虽未获直接政效，却初结西域三十六国，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再次西使，正式与乌孙结盟，引起西域诸国的由北向匈奴到内向于汉的历史趋势大转移，归封博望侯，自是汉使西去冠盖，相望于道。李广利伐大宛也发生于汉武帝之世，前后两次出师（太初元年至三年，前 104—前 102）引起西域诸国的弃匈奴降汉，归置护鄯善以西使者，留军屯守，这是汉人进入新疆地区之始。至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匈奴日逐王贤掸降汉，神爵三年（前 59 年）汉朝创立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任都护，驻节乌垒，自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入祖国版图，汉军官兵遂开始大批进驻。为了解决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粮问题，又创立了戊己校尉，总管军士屯田事，此职初设时官阶尚低，后来随着屯田兵人数的增多，渐与西域都护地位相埒，形成为两军府二元化管理的格局，东汉承袭此制不变。而汉军，实乃武装起来的汉族农民，既承担着屯戍西域的任务，遂大多长留不返,成了这一地区的新居民。据《汉书》、《后汉书》所记,它们分别来自汉中城固、太原、江都、天水、北地、茂陵、平陵、上封、山阳瑕丘、上党、陇西、安定临泽、南郡秭归、涅阳、酒泉、张掖、敦煌、武威等地,参稽居延汉简和罗布泊木简，还有河东汾阳、河南洛阳、颍川阳翟、以及汝南、大河魏郡、昌邑、济阳、东郡、淮阳、邺郡、巨鹿、广汉等地的人.尤以汾阳、[illegible]邑、汝南三郡人数最多。其中的屯田兵大多携家带口，也有的就地通婚，繁衍后代，而保持着中原华夏人的祖俗。因此，可以说至迟至西域都护府创立以后汉人已正式加入了西域多民族大家庭的行列了。

汉人是农业民族，主要从事的生产形式是农业，其基本组织形式是屯田。汉军本来就是由武装起来的农民组成，进驻西域后依然亦兵亦农，一手拿矛，一手拿锄，且耕且战，全部以军事系统组织起来，就称为屯田。汉人初来，先在塔里木河下游的渠犁、轮台一带屯田，接着屯田于乌孙国境，昭帝时扩大屯田于葱岭东，即今新疆地区。元凤四年（前 77 年）汉军又在楼兰的伊循一带进行屯田，自是汉军屯田已遍

及新疆各地。其地域包括渠犁、姑墨、伊循、疏勒、北胥鞬、精绝、交河、柳中、高昌壁、金满、且固、赤谷、伊吾等地，都属新疆的肥沃地区。汉人屯垦士卒种植粟、稷、麦、黍、高粱、豆类，蔬菜有葱、韭等，带来的先进农具主要是铁制的犁，小农具品种多种多样，包括锄、镰、木铣、木臿、木夯、铁斧、铁锛等。汉人率先以牛拉犁耕地，且施以粪肥。罗布诺尔出土的汉文简牍中记有‘……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字样。米兰遗址发现有犁耕痕迹。伊犁河流域有铁犁铧出土，足以印证这些农具和耕作方法的使用，由之农作物远远高产于西域的当地居民，在当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兴修水利（包括挖井和开渠）也是汉人对西域的一个重大贡献。挖井是一种地下水取用技术，大宛人早知秦人善挖井，有了井，人类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对河流的依赖性大为减少了。开渠则乃一种河流水资源的面扩展技术，故乡在黄河流域的汉人早已把它同提高农业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从事屯垦的汉军士卒由之在西域全面推广开来。史载敦煌人索励曾率敦煌、酒泉士兵千余人至楼兰，合鄯善、焉耆、龟兹三、四千人横断注宾河，修堰筑坝，掘渠分水，三年内“积粟百万”①。黄文弼也曾在今沙雅境内的黑太也拉克发现了长达 20 华里的汉代古渠。伊循的汉代古

①郦道元：《水经注》，卷 2

渠形制尤为完整，由一条主干渠和七条分干渠组成，这显然是汉代军垦战士的遗迹。

同农业相伴生，内地的手工业技术也以汉人为中介，传入了西域。西域汉人主要是军人，因此，首先关心兵器制造业的发展，新疆各地出土了大量的刀、矛、剑、镞等汉代遗物，多为金属制成，说明在兵器生产的带动下，金属工艺已有所发展。陶器是汉代主要的生活器皿，新疆的出土物多为灰陶，喜用水波纹，环圈纹、绳纹等内地习用的纹饰，而与当地民族的陶器造型、习用的纹饰有异。汉人精于丝织业，楼兰出土汉文简牍中明确记有“织府役卒”，说明专门备有织造匠人，但当地不产丝，丝绸原料必仍由内地运来，由屯田系统的织匠具体加工，分发士卒。汉人也经营畜牧业，除西域惯育的羊、马、驼，以及由匈奴传来的驴、骡以外，特重牛的饲养，还自内地引进了猪。汉文的‘家’字，就是屋宇下一口猪（豕），说明在汉人的观念中没有猪是构不成家的，既然汉人已在西域安了新家，自然必须把这种家畜引入这一地区。

关于汉人进入今新疆地区以后生活习俗是否有所变化？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总的来说依旧保持着自身传统习俗。如粟食，即以粮为主食。其中尤以麦、黍和豆类为主。主食是饼和粥。饼为面制烙成，当时尚不知发酵，都属硬面饼类。粥为米、黍熬制，还有肉糜，乃属于加肉的米粥，则属上层食品，以粮食菌化

加盐制成的面酱乃主要的佐餐佳品，屡见于汉简。此外，盐也似为按军士人数分发，看来普通战士生活仍很清苦，肉食仅为粟食的补充形式，主要的烹制形式为煮和烤，烤又谓之炮。汉画像石中所见以串烤肉的方法同今日维吾尔族的烤肉完全一致，辛香类调料已开始使用，豆腐传说乃淮南子发明，新疆已发现了豆类种植，必已开始造豆腐，并会生产豆豉，成为平民的美食。汉人是定居民族，每至一地，必营造住房，外修城堡，汉人的城堡多为方形或矩形，与中亚一带的圆形城堡有异，1972 年我在奇台县半截沟公社麻沟梁发现的石城子古城是天山北麓唯一现存的汉城遗址，据考证就是东汉名将耿恭抗匈奴之疏勒城，足为新疆汉代建筑的代表。该城虽依山而建，仍呈不规则的方形，皆为以土垒制，夯打而成。城中发现了大量实心大青砖和云纹瓦当，青砖大而坚实，必在当地烧制，云纹瓦当又分多种类型，其中还有施朱者，说明城中官署还砌砖饰瓦，一如内地，又据原苏联考古学家报导，李陵寝宫已被发现，这位汉将虽已降匈奴，然其寝宫仍乃纯然汉式风格，内出铜镜及“天子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瓦当，石城子也与之类似，不过等而小之而已。城中曾出土过一匹铜奔马，体瘦腿长，显然是汉代流行的天马形态，该城所在的公社(今为乡)还曾征集到一枚铜镜,亦为汉代形制。足以反映上层汉人的生活。普通汉民亦皆室居，住房主要

盛行土夯板筑，房顶呈两面坡形，有异于本地的平顶房屋，这是自半坡村时代以来以汉式建筑一直不变的传统。无分贫富皆为一堂两内，即一明两暗的建筑格局，贫者家徒四壁而已。皆开户窗，户即门，当门因光线较好，多置织机，“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①]就是这种住室的生动描写。到了隆冬，就用泥把窗子封死，来春再重新开启。人皆席地而坐，坐姿类似于跪，以足抵臀，身则直立，大约同今日本人坐姿类似，进食有矮案，食器多陶、木制品，已开始使用筷子，称之为“箸”。已经懂得用粮食造曲酿造度数很低的酒，酒器多使用下有三足的‘爵”，我国造酒始于殷人，而殷人饮器皆三足，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

汉人以‘衣冠之族’自诩，其服饰主要为丝、麻制成，重宽松，讲究以色彩区别身份，称为‘服制”，绝对不许僭越。官员衣锦帛，公务穿法服，即依官品所定制服，日常则穿常服，军官战时着戎装，但铠甲全身披挂起来，非常沉重，也不是日常服装。其实官员无论文武，平日皆穿常服。特点是宽袍、大袖，右衽，多有襟边，丝带，髻发，包发巾，加抹额，仕女多高髻、花襦、裙曳地，头饰珠玉，以高硕而苗条为美，普通农民则短衣褐，束发，麻带，草履，等级相差悬殊，定居西域以后，因气候同内地大异，加之当地居民的影响，

①《木兰词》

似也兼服毛皮类制品。其中革靴似最早在西域汉人中普及。毡帽似也在下层汉人中流行。

汉人沿袭周、秦以来的传统，乘车比骑马更重要。本来，华夏人一直以车代步，以战车为主要战具，以战车兵为主要兵种，骑马则乃学自塞人和匈奴，始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至汉虽已重视骑兵，但战车、硬弩仍为主要制胜之具，轻骑仅为之佐。汉代官员上朝亦不重骑马而乘车，可见车是汉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但进驻西域以后，骑马之风渐盛，且对驼、骡等西域驮畜的利用渐加重视，可见汉人西来以后，不仅把自身先进的文化带给了当地民族，而且也从当地民族中补充了许多新的文化营养。

随着汉人的西来，中原的汉文化也开始西被流沙，汉语言开始在西域发生重大影响。当时西域诸国都尚未创制文字，而汉文字早已源远流长了。因此这种文字很快在西域诸国上层人士中普及，各国一般都设有译语人，汉文已一度演变为西域地区的书面交际文字。汉人的历法也传入西域，这是一种以天干、地支相互配合而成的岁星历，即以木星的运行周期为基准的历法，并以十二动物分别命名。又谓之十二生肖。这十二种动物中的鼠、鸡、猪等都同农业有关，龙更是汉人独特崇拜的神性动物，汉人一直以历法作为遵从中朝正朔的重要标准，因而这套历法不仅在汉人中推广，也渐次在对汉称藩的西域诸国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推行。后来十二生肖历一直为西域诸国所沿用，不过略变其形态,这显然是汉文化的影响。在汉简中明确得知，一日中又分为十二时辰，即鸡鸣、平旦、日出、食时、东中、日中，日昧、下铺、日入、黄昏、人定、夜半等。并有日晷、铜壶等测察日影以计时，汉人即以此时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汉人的数学、医学都很发达，罗布诺尔出土了《九九歌诀》，说明古老的珠算、算盘也都传入西域了。汉方医学也已传入西域。居延汉简中就保存着许多古医方，其中还有兽医方。汉文化的主体乃是儒家的思想体系。这种哲学的特点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家族、血缘本位的伦理观；后来法家也被溶入了儒家体系，形成了以君主专制、天下一统、官本位为特征的政治观；居延汉简中已发现了古儒家经典的残籍，说明汉军将士虽身在边陲，但儒家教育仍传承不辍。在婚姻形态上基本上沿袭内地的婚制，上层存在着妻妾制度，下层则普遍流行一夫一妻制。反转来说，下层妇女地位一般较高，而上层女权反有所下降。汉代不禁止异族通婚，例如汉将班超就娶胡妻而生班勇。由之西域汉人后裔多已混入复杂血统。丧葬自古为汉人之大礼，皆土葬，并由竖穴土坑墓逐渐演变为洞穴墓，有棺有椁，皆为木制。人死后有条件者皆以死者生前日用物殉葬，最好是大量贵重物品，甚至演变为在陪葬衣物疏中虚报陪葬品的数额与种

类，并制作泥俑象征真人，以祈冥福。守孝服制一如中原，不同者乃屯田军士尚须为上级将佐戴孝，反映了西域汉人身列军籍，带有更多的超经济强制的色彩。

西域汉人的节日是中原华夏节日的移植，特点是所有节日都同农事活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典型农业民族的心态，而这些农事活动又都同某种自然神崇拜关。其中尤重视冬天的腊祭，兵士可“寝兵”五日，即放假五天，夏至时则行改火之礼，即熄灭去岁之火，重新钻木取火，以为盛典，立秋时举行“貙劘”之祭，驱逐疠疫，全年最盛大的节日当属腊节，应即《诗经·豳风·七月》中之“朋酒斯飨”，尽情酒肉聚餐之日，亦即后日之过大年。此外元宵节的来历亦非常古老，后来此节的重要性明显增高，似已上升至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妇女则另有自己的节日，据《孔雀东南飞》诗中反映，初七及下九乃是她们的节日，似乎反映了一定的女权制残留。

高昌建国与汉、晋旧俗的传承

两汉时期的西域汉军人数不算很多，却分驻天山南北各地,至魏、晋以降,汉人后裔已繁衍众多,但却居地大为集中。这是因为公元三世纪刘汉王朝已被埋葬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之中，三国之世，中原大乱，无力照顾边陲，西域局势随之亦动荡不宁，原来散驻天山南北各地的汉军纷纷东撤，聚拢于高昌壁、楼兰国一带，即今之吐鲁番盆地及罗布泊水域，再也不能东返，遂聚众自保，在此建设起碛外汉人的新家园。及晋朝代兴，置西域长史于楼兰海头；置戊己校尉于高昌，互为犄角，控制碛口，以之遥控西域局势，维护中原王朝在流沙以西的政治主权。但汉人虽屯戍西域，同两汉盛世已有所不同，早期仍坚持先代之军事编制,在高昌、楼兰皆置屯田,稍晚一些时候,伊

吾也成为汉人的聚居地。这一时期的西域汉人实皆军人而以楼兰的资料最为充分，楼兰汉军的组织与生活方式基本上也可代表高昌汉军屯垦士卒，因为二地驻军情形大体相似，不同者仅乃主管楼兰的最高长官是西域长史，而主管高昌的最高员乃戊己校尉，而二者分工虽略有不同，但都须管理屯田。因之本书选择楼兰为魏、晋年间汉人聚居区的代表。

楼兰地扼丝路南道碛口要冲，本塞人所建小国，位于罗布泊水域、孔雀河下游的肥沃绿洲，早在汉世已忠实地臣于中原王朝，加之国中人口不多，广有隙地，汉军遂在此屯垦，西域长史、戊己校尉两军府在行政上皆隶于凉州刺史治下，具体托管于敦煌郡。其下士兵皆且耕且战，以军屯组织编制起来，其下因事设曹，分司其职。根据现有出土楼兰简牍分析，西域长史府上层机构中几乎清一色是汉人，其下层屯兵中虽已加入了少量当地人，但仍以汉人为主。农业乃其基本生产形态。土地归军府所有，而按人配地，楼兰简牍 Cha·No.753 记其将张仓部 21 人耕 5 顷 12 亩，每人合 24 亩，这大约就是楼兰屯垦士兵的定额。这些士兵皆身列军籍，有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登记主屯士兵及其家属的名册，严禁隐匿、流动、逃亡，可见汉人士兵对上级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屯垦士兵在楼兰绿洲开荒，修渠，种植大麦、小麦、粟、禾、米、叔机等粮食作物，生产酒、酱、酢等粮食作物

副产品。仅从产量而言本来是绰绰有余的，在楼兰屯田的敦煌军将索励曾说，这一地区“大田三年，积粟百万”[①]。但屯垦士卒的口粮却须定量供应，依其级别高低、体质强弱分别定量为日食六斤、日食八升、日食六升不等。将吏却非但没有日食量的记载，而且还有廪俸。可见军屯汉军中等级森严，生活差别很大。汉军士卒除经营农业外，还须自营手工业，由巧于工艺者充任。生产犁、锄、锯、斧、锛、模等农、工器械，及兵器、盔甲、盾牌等，也有纺织业，皆立足于自给军资，兼给军食。出土简牍中也印证了有这类专业工匠，如“织府使卒”“模一具工邓”等，他们的地位一般比从事农业的屯兵地位要高一些，但较之当地的工匠仍要低得多。

汉朝本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曾严禁内地商贾至西域从商，因而虽然中原是丝绸的原产地，但丝路贸易的厚利几乎皆为胡商垄断。楼兰屯田初期汉军管理当局似乎也只准胡商与军府之间的贸易，但后来在周邻浓重的商业气氛中逐渐放松了限制。其市易活动形式主要有售、转售、转运、贷、寄售、寄藏等区别，主要商品除丝绸之外，还有蛇床子等中药及粮食、牲畜等。楼兰城中随之出现了市与市买使，说明商业贸易的盛行。但从事这一活动的似乎仍只

①《水经注》卷 3。

限于上、中层官吏，普通士兵连口粮都乃配给，恐怕根本无力进行任何交换了。

高昌乃碛外汉人的另一重要聚居区，其地建郡与高昌建国乃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新疆历史的重大事。这一进程反映了汉人由军户变为民户和碛外汉人开始在政治上独立发挥作用。纯军事编制的屯戍组织本来是配合军事进驻的权宜之计，长久维持这种体制不利于发展生产，久已自谋衣食的“汉军”士兵都厌恶这种组织形式，因之由军屯向民屯，由屯田制向郡县制的演变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迟前凉之世高昌地区已完成了这一演变，不久楼兰地区因孔雀河改道促成了绿洲的萎缩，汉军不能继续在此留驻，皆移驻高昌，这意味着全部西域汉人都已集中于吐鲁番盆地，并开始了由军屯向民屯的历史演变。前凉灭于前秦，秦主苻坚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再度进行西域经略，遣将吕光统兵西征，一度前秦的西部国界于龟兹，高昌郡以其扼碛口咽喉，连结内地的特殊战略位置，为保证这次西征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前凉亡于后秦，吕光还师凉州，创建后凉王朝，地跨流沙东西，高昌即为其极西之郡。北凉亡，西凉王朝又接管了高昌郡，其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展至伊吾，即今之巴里坤、哈密一带，西凉亡于北凉，高昌郡被北凉接管，西凉王裔李宝则率部下二千余家退保伊吾，史称后西凉。西凉是河西汉族李氏创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